

【会议综述】上研院联合主办“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研讨会

2017年7月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合主办“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这一主题，就“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领域与区域治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等议题展开研讨。



来自北京、上海和福建等地的十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中联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等机构的代表参与了研讨会并作发言。现将各位发言人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



目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对多边主义治理原则形成了重大冲击。关于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我有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在治理问题上的最大共识。这种共识自一战以后逐渐形成，几十年来，这种共识逐渐发展成一种在跨国领域进行治理的基本方式，即多边主义规则。第二个观点：反多边主义是反全球化的重要标识。逆全球化或者说反全球化（当然两者不完全一样），都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出表现，主要有三大矛盾：权力分布失衡、经济发展失衡和全球治理失灵。第

三个观点：多边主义仍将是全球治理模式。多边规则治理体制是迄今最合理、最合法的治理方式，它仍会继续向前发展。为促进多边治理体制朝更加民主、更加协商、更加合法的方向发展，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维护，另一方面是改革、改良、补充和加强。

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董卫华：《新型全球化与新型全球治理》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期。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泛滥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还有保守主义。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全球缺少相互协调的公共产品提供，难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形成创新动能。

逆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发展，其本身也是全球化发展的一部分。它一直存在，只不过现在进入了发展的特定阶段。面对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困境，中国正在积极地推动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它有如下特点：更多地强调公平、开放、包容、民主、可持续性，以及强调把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打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可以成为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引导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黄仁伟：《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体系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从全球治理的外围走向中心，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非西方和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第一，我们确认全球治理和人类共同命运是一致的，互为表里。第二，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关系，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全球的矛盾体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第三，全球治理是一个由西方治理或者说美国治理向全球治理转化的渐进过程。第四，全球治理需要有重点、分领域地推进。第五，全球治理要和我们的其他战略结合，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等。第六，全球治理要与中国国家治理相结合。第七，全球治理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必经之路。第八，全球治理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新机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杨剑：



关于今天的主题，我想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谈三组关系的变化。

第一，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为主的世界体系的关系。从决定改革开放起，我们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有

三种价值取向：一是防范，二是开放，三是全球化。这三种价值取向既有时间向度上的递进关系，又伴随我们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第二，是中国和国际规则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叫学习规则，与国际接轨。到改革开放中期，我们在学习规则和适应规则的同时，通过谈判争取优惠，甚至要做规则的例外。现在，我们面临着不得不参与制定规则、引导全球治理方向这样一个情况。

第三，是影响力提升与公共产品提供的关系。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离不开对区域甚至全球的公共产品提供。我们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来提供公共产品，一定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限制。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开始在区域里面提供更大比例的公共产品；但这里的公共产品是否能再细化一下，将公共品（public goods）和共享品（shared goods）做一区分。这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与中国更加持久的合作，更有助于产生内生动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领域与区域治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主编胡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意义》



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还没有真正的界定。

我在这里试图对其内涵及其意义进行解读：首先，其价值基础是中国传统的“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其二，其理论基础至少包括四方面：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不结盟的理论、全球化

全球治理理论、现代化理论。其三，其实践基础包括：对外开放、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现代化战略新布局的实践。其四，其具体内容，包括共生、共存、共治、共享、共建五大理念组成的思想体系以及共同的价值、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利益等目标诉求。其五，其实现路径至少有五方面的创新：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创新多边平台、创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创新中国周边外交、创新实践手段。其六，其对全球治理的意义，包括中国价值上升为全球治理

价值的可能性、国际体系创新的可能性、中国在自己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下承担国际责任以及中国方案能否成为一种全世界可选择的世界方案，等等。

复旦大学文科处处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刚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国际治理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三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人类作为一个全体取向，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共同体，命运休戚与共、安危共担。

由此演绎出若干思维：一是共同体里安全的基本性；二是共同体取向与全球性取向相呼应；三是共同体内部的互相联系，需要“关系治理”；四是共同体秩序维护的要求，需要“社会治理”。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来理解全球治理的话，全球治理应该是一种广义的全球治理，而非狭义的全球治理。后者主要是针对一些因为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治理需要，前者则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出发的治理，以联合国为重要核心，包含多边、多层、多中心的开放治理体系。也即新型的全球治理。这种新型全球治理是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照下面，以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全球治理的行动原则，是有规划、有组织的全球治理；包含安全为基础的思想、“通”的思想、发展的思想、德智共治的思想等。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刘贞晔：《全球治理概念内涵的漂移、中国崛起与新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已近30年，其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概念的提出，当时与其说是全球治理，不如说是治理全球，本质就是西方来治理非西方的世界。二是90年代后期，治理的对象是全球性问题、全球性危机、人类发展面临的全球性困境。本质上，是治理对象由非西方转向西方的转折点。三是2000年以后，治理这一概念走向实践，这是一个国际组织推动、大国引领、大面积全球伙伴关系的阶段。2008年是一个重大的分界线，全球治理的概念在此再次实现重大的内涵漂移，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性问题、地区性热点等成为全球治理的聚焦。这些问题的同时纳入，使得全球治理的概念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传统的西方国家成为治理对象、治理问题

的来源。二是传统的国际组织在治理上无效，甚至无能。三是新的治理行为体产生，新兴大国崛起。四是大国治理成为主导性的内涵。

上海财经大学全球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财大科研处处长靳玉英：《国际经济关系秩序的演化与构建》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始于美国，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经济区域化，后来出现了双边化、局部多边化等特征。即在现有的体系之外重新构建其他合作范式。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是过度全球化的结果。次贷危机和东亚紧急危机是典型的过度全球化的结果。危机是检验全球治理体系领导者实力的试金石，也是促使体系变革和经济体系形成的有效动力。随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的边话，大家距离越来越近，美国不得不改变其治理范式，把更多的国家拉进来一起治理全球经济。去全球化是中国谋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主导地位乃至构建新体系的难得机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叶青：《国际秩序变革与全球安全治理新挑战》



当前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和变革的周期，人类社会面临历史性转折。在安全领域我们面临的形势是新的秩序将立未立，各种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同时也孕育着从对立转向统一的契机。现在的体系变革中面临三方面的辩证矛盾：一是力量格局的新老交替。二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相伴而行。三是变和常、乱和治的共存。全球安全治理也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与经济因素相互结合、推波助澜，松动了国际安全原有的基石。二是排他性的结盟政策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三是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愈发突出，发达国家有所退缩，新兴大国机制引领力不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



在今天全球治理研究当中，需要重点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有几对关系：一是一和多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和全球治理

的概念，只是当今世界对全球治理的一种引领。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对其可能有多种解读。二是合与分的关系。当今世界究竟是沿着进一步整合的方向发展，还是更加碎片化，更加分裂？三是和与斗的关系。尽管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但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都存在挑战和平的斗争。四是霸与王的关系。西方更多是讲强制性的治，中国是讲协商式制度。五是新与旧的关系。全球治理中的旧机制与新机制之间如何磨合、处理的问题。六是软和硬的关系。全球治理制度安排中需要硬性的不够硬性，一些软制度又远远跟不上。七是利己和利他的关系。

三、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

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贵洪：《从参与到引领：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几点思考》



中国从参与国际组织到引领性地参与国际组织，在以下几方面的趋势表现较明显：一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二是中国在若干领域、在某些问题上开始发挥引领的作用；三是通过国际组织开展对外援助。四是中国倡议主导成立国际组织。五是在国际组织峰会上提出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智慧等。六是中国公民担任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七是中国和国际组织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开展引领性参与，有几点建议：一是将我们提出的理念、倡议、方案等议程化；二是在国际组织当中“走出去”；三是“请进来”；四是创建一些新的国际组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改革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参与国际组织改革建设的基本经验，我主要讲两个。第一个就是增量，第二个是协调。首先，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改革和建设，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做增量工作。197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参与了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加入了大部分国际条约。我们对这些国际组织改革的态度不是相互取代，而是竞争关系的共生思维，和平发

展、和平竞争。而我们建立起新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在老的国际组织做不到、不能做或者不愿意做的议题领域，以及新兴的问题领域。新老国际组织之间保持一种对话合作。其次，国家治理体系和领域的现代化与国际制度体系保持着一种合作的关系、协调而非对抗的关系。我们跟国际组织的外交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怎样通过多边国际组织，把中国特色、中国方案转化成国际普遍的、一般的，即“中为外用”。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经济事务官梁国勇：《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制度性话语权主要指的是系统的引导和影响，国际经济领域重大议程、相关决策和实施过程的能力。主要指的是制度方面，即机制性的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要从机构、程序和规则几方面着手，涉及存量改革和增量导入，后者是重要的改革方向。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矩阵，首先是领域，可能涉及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方面；其次是层面，涉及多边层面、区域层面、双边层面等。在这样一个矩阵的分析架构里面，其实各有侧重。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几个转变：一是对体系的不满，二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在世界经济比重的变化，原来的东西方的权力分配关系已无法反映这种新的权力平衡。在贸易领域，多边贸易体系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受性很大。国家集团对全球经济体系变革并不具备强助力。

福州大学法学院李春林教授：《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透视》



我谈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透视，提三个问题。一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二是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化。三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总体上讲主要是供给严重不足。全球公共产品包括自由贸易、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等三个层次，三者是统一体。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晚近转向，可以说我们同时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又是一个坏的时代。引领性参与很好，可促进分享、促进生产模式的供给等。

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助理王蔚教授



关于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在理念和行动，在现代理念和传统理念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实际上也表明我们在融入世界、走向全球的过程中的重大突破和进展。“一带一路”是我们把理论实践驶出现实，把国际规则与国内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很好的尝试。但是怎样能够使大家接受，同时又作出中国的贡献，这确实是一个挑战。现在谈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普通民众对此认识，实际上还有很大的落差。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武心波教授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总结和经验探索。我想从思想、利益和行为三个方面谈谈几个想法。第一个谈思想，就是中国对待国际组织的态度，实际上是不断改变、重视的思想过程，这种转变反映出中国世界观的一种悄然改变。第二是利益问题。利益诉求不断变化是中国对国际组织态度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世界观是由内而外的，这样的逻辑转变过程中，表现在利益诉求上，从小到大、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开放包容精神。第三个是行为。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行为逻辑，可以做这样几点描述，一是从行为的间接性转为直接性，二从被动转为主动，第三是由消极转为积极，第四是由参与转为引领，第五是由融入转入改革，第六个是由国内的方案走向世界方案。

（郑英琴 整理）